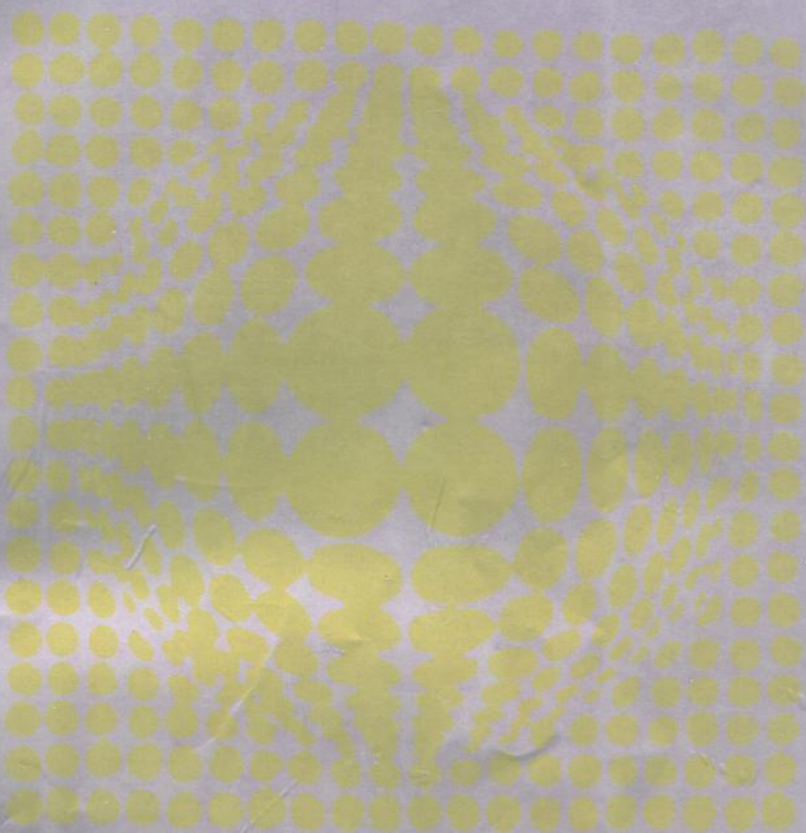




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久榮

辽宁民族出版社

22.9
310
1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邱久荣 著



1992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58802

辽新登字 7 号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邱久荣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彰武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5 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印数: 1—425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林英淑

责任校对: 周 全

封面设计: 日 辰

版式设计: 文忠实

ISBN 7-80527-270-0

K·41

定价: 6.00 元

绪 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约 1 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 56 个民族，总人口为 1 133 682 501 人，统称之为中华民族，其中汉族为主体民族，人口为 1 042 482 187 人，占总人口的 91.9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91 200 314 人，占总人口的 8.04%。^①

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不论作为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学者，还是中华民族普通的一分子，都应该有所了解。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然而时至今日，还没有专著较系统地科学地论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总过程，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更有甚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不少史学论文受传统观念影响和认识的局限性，发表了不少错误的言论，扭曲了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讨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论文中，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论述，虽不乏卓识之

^① 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其中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人口未统计在内。

2 绪 论

见，但同时也有一些奇谈怪论；而在诸多中国通史专著中，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论述，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见，妨碍了人们较正确地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总过程。因此，目前加强和深入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非常必要的。

二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社会学、民族学大师费孝通教授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①这个精辟的结论，既适合中华民族的形成，也适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即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其中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汉族是主体民族；第二，各族间存在着血肉联系；第三，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的历史。

汉族起源于黄河流域，自西周华夏族体的形成，每时每刻都在吸收四周各少数民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今天的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的结局。其中，在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处于衰弱时期，四周各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各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则进入一个新时期，经过分裂与统一的斗争，汉族即得到一次飞跃性的发展与壮大，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

^① 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五代十国、辽宋金时期，无不是如此。与此同时，往往因大量少数民族内迁，引起中原地区的汉族向边远地区迁徙，使边远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情形越来越扩大，其中有些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普遍的情形则是大量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之中。另外，中原王朝不论是何族为统治者，只要其势力强盛，也会导致大批汉人进入边疆地区，如汉、唐、元、清朝，由于其疆域广阔，大量汉人因从军、移民或为官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扩大了各民族杂居形态，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汉族是主体民族，绝不仅仅是在秦汉时汉民族形成就表现出的人口众多，而主要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处于先进地位，因此，十六国、北朝、后唐、后晋、后汉、辽、金、元、清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各族，或占有中原地区，或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汉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内迁各族除蒙古、满洲外，差不多都被吸收到汉族之中，就连元朝灭亡后留居内地的蒙古人也不例外。汉族能够成为主体民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自秦汉时确立的一整套政治、经济、衣冠礼乐制度，其后历代虽有变革，但发展脉络的连续性是非常清楚的，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文化，其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经典具有纽带作用。因此，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不论其统治者是否推行歧视汉人的政策，他们都继承了中原传统文化，所以汉族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过；当然，各族统治者也为中原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内容，使其更加丰富多采，光辉灿烂。汉族既然是主体民族，汉族的发展史就自然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主干线，汉族统治阶级建立的中原王朝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的代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其统治者都继承了中原传

统文化，他们所建立的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总脉络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同样也是中国的代表。也就是说，尽管历史上中原王朝统治者族属不同，但他们却共同地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有机连接体。

历史上的各民族间血肉关系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又一重大问题。它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即汉族与四周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四周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主要的，但不能忽略后者，例如：秦汉之际赵佗统一越人地区、匈奴统一北方大草原，唐朝南诏统一云贵地区、吐蕃统一青藏高原，汉唐间匈奴、突厥、回鹘与西域诸城国的关系，元朝以来形成的蒙藏关系、蒙维关系，清朝的满蒙关系，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都具有重大意义。所谓民族关系，主要是指各族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如果把各族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方面，就会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当然也是违背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及民族战争、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等诸多方面。一般说来，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各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是经常的，相对的和平共处占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先进的中原文化不断地传播到四周的各少数民族地区，而四周各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样不断地传入内地，内地与边疆得到共同发展，各族间的共性越来越大，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多。民族战争在历史上不断发生，曾给各族人民带来不同程度的灾难，但往往伴随战争的结束，各族间的联系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中鲜卑拓跋部、女真、蒙古、满洲等族贵族发动的入主中原的战争，既历时较

长，破坏性又较大，而在战争结束后，各族间的交往情形都超过了其它历史时期，不论对内迁各族的自身发展和汉族的发展壮大，还是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是歌颂或肯定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不过是申明不能不加分析地否定民族战争的一切，其中尤不能忽略民族战争产生的后果。再举一例，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战争，夺取河西走廊地区，不仅使内地与新疆地区发生了直接联系，而且开辟了在世界史上享有盛誉的丝绸之路通道，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民族迁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有主动的，有被动的，不论哪一种情形，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往往打破民族分布的格局，形成多民族大杂居状况，随之便出现民族大融合，如春秋战国时期夷、蛮、戎、狄的内迁，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的内迁及中原地区汉族的外迁，辽宋金元时期契丹、奚、女真、蒙古的内迁，唐朝晚期蒙古高原的回鹘西迁，等等。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民族融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是普遍性。它的特殊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族或数族人民大批地融合在另一民族中，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和南方的蛮、巴、僚、越等族，或大部或部分融合于汉族之中，使汉族空前壮大。这种情形在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又来一次重演。所谓民族融合都具有双重性，以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之中为例，被融合的少数民族都给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春秋时就有“学在四夷”的说法^①。南北朝时期，汉族的语言、衣、

①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孔子语。

食、住、行等方面无不打上南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烙印，这是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普遍结果，但还不是主要方面；更重要的是被融合的各少数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更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宋末元初著名学者胡三省惊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子孙（指鲜卑等族后裔）十居六七。”^①即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历史上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也是常见的，如魏晋至唐初，云南地区的一些大姓，以及大理国建国者段氏，传说他们的祖先都来自内地。大凡由内地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汉人，过不了几代，便从少数民族之俗，成为少数民族，他们带进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及生活习俗，至今不少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与汉族生活习俗有相似或相同之处，与此不无关系。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也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匈奴、鲜卑、柔然都长期地活动于北方大草原政治舞台上，到隋唐时则消声匿迹了，他们之中除内迁一部分、西迁一部分，留居大草原的当不在少数，这一部分应融合于突厥以及铁勒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大草原的统治民族变来变去，但其主要的居民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者说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如果这个认识是合理的，那么今天的蒙古族与历史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族都有一定的联系。总之，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

① 《资治通鉴》卷108注。此说虽有夸张，但基本符合史实。参见拙文《鲜卑贵族在隋代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其中主要发展脉络是：汉族不断融合各少数民族，使其人口众多，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不断向四周发展，又由于其政治、经济和衣冠礼乐处于领先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各少数民族在长期与汉族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向心力，从而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组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自秦汉就开始形成，至清朝已完全确立起来，经历了二千年左右的漫长时期，来之不易。到了近代，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发展成了休戚与共、同生死共存亡的统一体，中华民族终于形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经受了洗礼和考验。

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历史，这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指出：“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缔造的结果。”^②这个结论已为学术界所认可。但是，它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即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统治者”被忽略或回避了，显然是一个缺欠。汉族是主体民族，这本身就反映了汉族在缔造中国历史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因此勿庸赘言。这里只从几个方面论述少数民族在缔造中国历史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第一，各少

① 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第1页。

②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载《学习》3卷1期。本文转引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集）白寿彝《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

数民族绝大多数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边疆地区，他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开发了边疆，成为边疆地区开发的主力军。从东北的白山黑水、松边大平原，北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天山南北、青藏高原，西南部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到南部的两湖、两广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无不如此，其中有些地区如今虽然多为汉族居住，但在历史上却首先由少数民族开发起来的。第二，各少数民族，包括历代在边疆地区建立的政权，由于他们的努力以及中原王朝势力不断向边疆地区伸延，逐步确立了中国的疆域。其中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如北部的匈奴单于国、突厥汗国、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国，西部的吐蕃王朝、黑汗王朝，西南的南诏、大理国等。特别是自清朝开始，各少数民族为保卫祖国的边疆和领土的完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至近代表现的尤为突出，不论东北、北方、西部还是西南地区，也不论民族大小、先进与落后之分，他们都流了血，做出了巨大牺牲，其贡献永载史册。第三，自秦汉以来，各族人民经常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国封建社会及近代的大多数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有少数民族参加，这是他们长期密切交往、共同生活和共同命运所决定的。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有的农民起义还是各族联合进行的斗争，不少少数民族人民成为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如西晋末年各族人民起义，十六国后赵的梁犊起义，北魏盖吴起义、六镇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及太平天国运动等，无不如此。第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对中原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北方、西北、西南各族大量牲畜及畜牧产品输入内地，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源源不

断，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其中大量的马、骡、牛的输入，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无法估计。另外，各少数民族的农作物、瓜果、食品做法等也大量传入内地，晋朝张华的《博物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元朝的三大农书、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著作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齐民要术》就记载了数十种，如胡豆、黄高丽豆、黑高丽豆、虜小麦、胡麻、敦煌瓜、越瓜、胡瓜、胡葵、胡蒜、胡葱、胡菜、胡荽、兰香、南夷姜、胡芹、胡葱、苜蓿、胡桃、葡萄、胡栗、安石榴、胡椒及胡羹、羌煮、胡炮肉法、胡饼、胡饭法等。特别是宋末元初，棉花种植和织布技术由海南岛黎族地区和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传入内地，并很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传播开来，对内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至今棉花的种植在经济作物生产中依然具有头等地位。就连今日生活中的桌椅板凳之类，也是首先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东汉末年出现的胡床，在魏晋南北朝时还只是士大夫的一种享受，隋唐时才广泛地传播到民间，从而改变了原来席地而坐的习俗。在文化上，各少数民族都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历史上，对中原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服装、语言、音乐、舞蹈等尤为突出。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把北方游牧民族服装引入中原地区，汉族服装不断吸收北方各族服装的款式，其中魏晋南北朝、辽宋金元和清朝时影响最大。在语言上，从汉族形成的秦汉时期，其语言就包括西戎和南蛮的成分。秦出于西戎，它的语言自然有西戎的成分；秦统

一全国前，楚国的屈原作《楚辞》，“书楚语，作楚声”^①，今天借助古人注释依然可以看懂，表明楚语、楚声也被吸收到汉语之中。北齐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南北朝的汉语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即南北方汉语分别受南北方少数民族影响。因此，隋朝统一全国后，陆法言等作《切韵》，并不是无的放矢。其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的语言对汉语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自古以来，各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从汉朝南蛮的歌舞开始在宫廷中演奏和表演，少数民族的歌舞是宫廷音乐、舞蹈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北朝、隋、唐、元、清各朝更为突出。总之，汉族的衣、食、住、行和文化生活无不打上少数民族的烙印。第五，一些少数民族还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中亚的杂技、魔术是通过新疆和云南传入内地的，佛教、伊斯兰教等也首先是通过新疆地区传入内地的。其中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各族，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突厥、吐谷浑、回鹘、党项、畏兀儿、回回等族自唐朝以来先后活动于丝绸之路上，大批商贾进入内地，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不同时期的中原王朝统治中心，还都有很多“坐地为商”者，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第六，各少数民族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或在本民族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或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崇高地位，而永载史册。

以上三个方面，彼此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且历史时期不同，表现形式和程度也不尽相同。

^① 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

三

讨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离不开地理环境。人类生活于自然界，大自然就必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大致说来，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和影响，与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成反比，人类社会越发展，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就越小，而人类社会早期，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同时又决定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渭水流域地区文化即中原文化率先发展起来，并逐步向四方辐射，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干线。随着考古学成果的不断出现，证明了中华大地上在旧石器时代，东北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西至西藏，都有早期人类的活动。费孝通教授指出：“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环境。”^①即中华民族起源具有多元性，这一独到的见解已被学界所赞许。到了新石器时代，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差不多都发现了人类的活动，而且充分表现出各自的文化特点，更进一步证明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同时，考古学研究成果还证明，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和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向西扩延，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向黄河中游和江汉平原、长江下游扩延。费孝通教授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

① 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第3页。

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①。即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人们已经开始发生交往和联系，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文化就开始向西、向南辐射，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辐射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黄河中下游和渭水中下游流域，西部是八百里秦川和较低平的黄土高原边缘，东部是黄河冲积而成的广阔大平原，皆以黄土地为主，降雨量适度，气候较干燥，日照时期长，四季分明，为早期的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构成了旱地农业文化的模式，主要农作物是粟，自磁山文化开始出现粟，一直到近现代，粟仍然是华北和西北地区的主要食粮，这也证明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之深。这一地区地势低平，交通方便，各人们群体容易进行交往与联系，所以反映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仰韶文化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龙山文化分布地域广泛，发现的考古遗址也最多，当时的人们交往是很频繁的，并逐步发展成强盛的部落集团。因此，夏朝在这里率先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统一的华夏族体。华夏的衣冠礼乐明显地高出四周的夷、蛮、戎、狄，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到宋朝，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领先地位，南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虽然南移，江浙地区的文化也高于中原地区，但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夏商周三代，中原文化经常不断地以各种途径向四周辐射，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起了纽带作用。

^① 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第4页。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丛山峻岭林立，江河湖泊交错，降雨量大，气温较高，潮湿，易于植物生长。考古学证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水稻，稻至今仍是这一地区人们的主要食粮。但是，在生产力较低下的年代里，水田农业生产难度大，不易开发，发展缓慢；再加上交通不便，人们之间常被山谷、江河所隔绝，阻碍了人们的交往与联系，影响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因此，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南方的经济与文化明显地落后于北方。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人口大量涌入南方，唐朝和五代时期的吴越等国对南方的开发，北宋末年中原人口又一次大量南迁，才逐渐使长江、珠江流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起来，所以南宋时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正是长期以来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也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优越的地理环境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

四川盆地，号称天府之国，但在夏商周三代却默默无闻。战国秦国占有巴蜀之后，李冰父子开凿了都江堰，川西平原得到了开发，才令人注目。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地区在政治上从未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原因是，四川盆地冬暖、春早、夏热，无霜期长，降雨量丰富，盆地底部海拔在300—600米左右，约占近1/10的平原和50%以上的丘陵地区，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都江堰的开凿又使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增添了光彩，两千余年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盛誉。然而，四川盆地的四周为大凉山、邛崃山、大巴山、巫山、大娄山所环绕，海拔大致在1 000—3 000米之间，形成了与外界相隔绝的局面，影响了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联系，使其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在政治上，自战国先后为楚、秦占有后，除在分裂的年代里先后建立过蜀汉、成汉、前蜀国、

后蜀国外，一直在中原王朝统治之下，而且这些“蜀国”的建国者都不是巴蜀居民，而是“外来户”，也说明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就民族方面看，秦汉以来，盆地底部地区的平原、丘陵地带多为汉人居住，而山地和环绕盆地的高山地区则为少数民族居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人居住地区不断扩大，少数民族特别是蛮人融合于汉人的数量越来越大罢了。

黄河流域的北部地区，即河北北部滦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地区。春秋战国时，尚属戎、狄族体活动地区，从事游牧业。这里多为低平山地和黄土高原，具有适合农、牧业生产的双重性。因此，伴随春秋的大国争霸和战国出现的区域性大统一，大量的戎、狄部落被兼并，融合于诸夏之中，这一地区逐渐成为农业区。秦始皇修长城，基本把北部中国的农业区与游牧区划了一条界，汉武帝击败匈奴，在河西地区开辟四郡，移民以实之，又使河西走廊转为农业区，从此，北部中国农牧区的分布格局一直沿袭到清朝。当然，由于河西地区水草肥美，是游牧的好地方；内蒙古伊克昭盟即历史上的“河南地”，起初决不是沙漠遍布的荒凉地区，而是水草肥美的良好天然牧场，因此，北方游牧民族常常南下争夺这一地区。特别是这一地区与北方大草原相连接，成为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屏障，所以自战国以来，不断修筑长城，并派重兵镇守，除元、清实现了北方大草原与内地的统一外，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在这一地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

东北地区。大兴安岭把北方和东北分成截然不同的草原和森林两大文化区。东北的北部是松嫩大平原和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南部是辽河平原和低平的丘陵山地。这里目前是中国